

曾静◎著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
女性形象的认同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 静◎著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
女性形象的认同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的认同构建 / 曾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4194 - 6

I. ①云… II. ①曾… III. ①少数民族—史诗—女性—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云南省 IV. ①I20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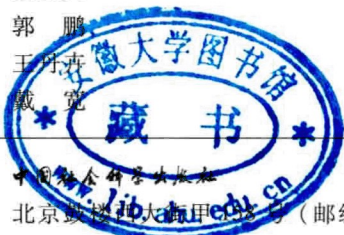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12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王丹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大街甲 13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认同的研究综述	(3)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认同研究的 价值意义	(15)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及篇章结构	(21)
第一章 史诗、叙事诗等典范传唱对女性形象认同的塑造	(29)
第一节 女性身体形象认同的构建	(31)
一 永恒的生命创世象征体的女性身体形象	(32)
二 破坏性的女性身体形象	(37)
三 理想化的美丽女性身体形象	(44)
第二节 女性行为形态认同的构建	(50)
一 作为执于爱情者的女性行为	(52)
二 作为婚姻施予者的女性行为	(62)
三 作为坏事者的女性行为	(67)
第三节 女性角色气质认同的构建	(72)
一 两极化的母亲角色气质	(73)
二 勤劳持家的妻子角色气质	(77)
三 前后变化的女儿角色气质	(79)
第二章 以妇女为吟唱主体的歌谣对女性形象认同的构建	(83)
第一节 情歌对唱中女性形象自我认同	(86)
一 “对歌择配”的形象与女性自主的荣誉感	(87)

2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的认同构建

二 “对天盟誓”的形象与女性忠执的情义观	(95)
第二节 婚嫁歌唱中女性形象的自我认同	(102)
一 “巧言索聘”的形象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彰显	(103)
二 “哭嫁新娘”的形象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焦虑	(109)
第三节 其他生活歌谣吟唱中女性形象的自我认同	(116)
一 “姑娘手儿巧”的体面	(116)
二 “媳妇最可怜”的苦闷	(124)
第三章 典范传唱与自我吟唱中女性形象认同的交互构建	(127)
第一节 典范传唱与自我吟唱中女性形象认同的叠合 与差异	(127)
一 女性角色形象及认同的叠合与差异	(128)
二 女性行为形态及认同的叠合与差异	(133)
三 女性身体形象及认同的叠合与差异	(135)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认同的交互 构建	(140)
一 “完型镜像”式的认同方式	(140)
二 “片段感发”式的认同方式	(143)
三 两种方式之间的交互构建	(147)
第四章 从女性形象的性别认同到民族审美认同	(150)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性别认同的 层面及特征	(150)
一 女性性别认同的基础层面	(151)
二 女性形象的认同层面与关系特征	(153)
第二节 当代视野下云南少数民族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 和途径	(156)
一 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与困境中的自我认同	(157)
二 寓女性形象的“性别认同”于“审美认同”之中	(162)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审美认同的 特质	(166)

一 “女性与自然亲缘同构”的审美意识	(167)
二 “两性耦合共生”的审美取向	(171)
三 “不离日用伦常”的审美趣味	(174)
结 语	(178)
参考文献	(183)
后 记	(197)

导 言

在“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从未远离人们关于信仰、人欲，甚至宇宙自然规律的思考。本书主要以《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史诗歌谣卷》（上、下）为文本基础和线索，来描绘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创世古歌、叙事长诗及其歌谣中较为突出的女性形象，分析其中所隐含的性别话语运作及其美学意义。近年来，国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以现当代小说为分析重镇，详解其中的女性形象与特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也部分进入其研究范围，但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女性形象却并未得到较多关注。尤其，以“认同”作为一个理论分析范畴来对口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见。“‘认同’乃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最迫切——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近二十年来，从后殖民研究和族群研究到女性主义和怪异理论各领域中，认同一直是精神分析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论争的焦点问题。”^① 本书欲借“认同”这一理论分析范畴，除了展示出史诗、叙事长诗等典范传唱如何建构女性形象的集体认同外，还将分析妇女在自我吟唱中如何表述自我认同，及其二者之间叠合差异的情况。并且，本书将从中观察其性别话语陈述如何寄寓于一些更基本的审美元陈述中，以及深入解读性别隐喻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等。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的提法其实包括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创世古歌、叙事长诗等传唱典范，以及情歌、生活歌、劳动歌、

^① Paula M. L. Moya and Michael R. Hames-Garcia, eds., *Reclaiming Identity: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1.

2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的认同构建

儿歌等篇幅较短的歌谣。《中国歌谣集成》将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少数民族史诗、叙事诗收入其歌谣集，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史诗歌谣卷》也将史诗、叙事诗、叙事歌和情歌、生活歌、劳动歌、儿歌等篇幅较短的歌谣合编为一卷，并命名为“史诗歌谣卷”。本书援引这一做法，所谓“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其实包含了上述不同的民间文学形式，下文不再赘述。《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中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少数民族歌谣，集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歌谣之大成，为本论文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遗产总目提要·史诗歌谣卷》（上、下）则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史诗、叙事歌谣和歌谣4958项，为本书提供了较好的文本线索。而且，经过查阅和对比其他文学集成^①，发现创世史诗、创世古歌和叙事长诗中包含了大量神话和传说的要素，既具有诗歌的形式，又包容了其他文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细节内容，因此是研究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集体表述的较好对象。不单如此，这两套丛书中所收录的大量少数民族妇女自我吟唱的歌谣，也为对比、分析女性形象认同的集体表述与自我表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结构性框架。

在把“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当成是可靠的“真实”来阅读之前，人们可能首先需要学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虚拟的话语建构，即把它当作历史的想象而不是历史的事实来看待。当然，本书仍然会结合一些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真实生活的学术成果，以期待展现出文学的虚拟性建构与权力话语运行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妇女口头文学歌谣尽管经过了文人的搜集整理，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妇女原汁原味的自我表达。而这种女性自我表述，则将成为描述女性自我认同的重要的美学资料。本书期待在以集体表述为主的女性形象和以女性自我表述为主的女性形象之间，折射出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的认同和社会

^① 经查阅和对比同一套丛书中的不同集成卷，即《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的《史诗歌谣卷》、《神话传说卷》和《民间故事卷》。

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微妙关系。既要在文学性中洞见话语权力的运作，也要在话语权力运作之中欣赏其文学性。因为，即使是最极端的他者的男性化幻想也源自于社会现实，而且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实践。性别认同所裹挟的复杂性，使得该论题的探讨显现出充分的必要性。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的认同构建”其实包含着三个阐述的重点：“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确定了论题特定的构成材料和阅读范围；“女性形象”是论题围绕的研究对象；“认同”是论题的最终归属。“材料”、“对象”与“归属”是展开论述的重要内容。而在正式进入论述之前，导言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为本书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第一节主要是对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认同研究的综述，体现本论题的研究价值意义；第二节主要阐明研究女性形象认同的两个重要维度，以及女性形象认同所包含的内涵；第三节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以进一步推进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认同研究。

第一节 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认同的研究综述

“认同”，英文 identity，最早是个哲学问题，被用来说明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其基本含义为“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者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① 其核心内涵即“同一性”，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有所具化：在逻辑学研究中，重在两个或更多在三段论中不可改变的真值；在心理学研究中，往往指的是个体对于自我的追问和个体自我意识的确认；^② 在社会学研究中，常常指的是群体确认自己特定社会身份地位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如性别、阶级和种族等。自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将 identity（在心理学里被很好地译作“自我认同”）作为自我意识产生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埃里克森的《同一性：青年与危机》一书使得“自我认同”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驰名的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追问，逐渐被埃里克森及其他学

^① James A. H. Murray, Henry Bradley, W. A. Craigie and C. T. Onions, ed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V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620.

^② 参见周宪《文学与认同》，见《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者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①也就是人们对某些事物、群体、自我产生感性或理性的认定与赞同,进而化为身份、知性与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女人(作为群体的女人)是什么”、“我(作为个体的女人)是谁”的追问,同样伴随着其理论的发展并成为其核心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认同”是个晚近的命题,但回顾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一系列运动、潮流、论争和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的性别认同有关。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争取选举权、财产权的第一次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影响深远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再到当代的多元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身份的界定和建构既是女性主义理论的起点,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理论批判和反思的重心。同时,无论是“男权制与性别塑造”、“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还是“女性创作与女性的身体话语”、“后殖民女性主义与身份认同”等等女性主义文学命题,无一不可从认同的角度再次得到新的审视和阐发。

女性的认同建构,从客观上来说,主要强调女性人格统合和一贯性;从主观上讲,则是指女性对自身的确信(或感觉),这个确信中包含着周围人对其一贯性和连续性的承认的确信(或感觉)^②。“同一性”是进行女性身份认同研究的基点,但主客观之分以及自我认同中的层面交叉,决定了关于性别认同研究的角度是复杂的。而由于寻求认同内涵和依据的角度不一,也使得女性主义文艺理论自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笔者之见,可以归纳为四种角度:

第一种角度:以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运动为代表,这一阶段女性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对妇女所遭受的共同压迫和共同任务的认知上,并跨域了民族、文化、阶级、地域、职业等边界形成了“妇女”这一概念的一致性表达。启蒙思想为女性主义运动提供关于平等、自由、公平的现代政治理想,也为形成作为整体的妇女(women)身份提供了依据。在启蒙主义理想的召唤下,法国奥伦比·德·古日的《女

^① 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② 参见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权宣言》、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以及美国伊利莎白·斯坦顿三位女性起草的《权力和意见宣言》，均围绕着妇女“被压迫”的“社会共相”展开：比如经济上男性掌握财产继承而女性不掌握；社会上男性主要占据公共空间而女性退守家庭；政治上男性主导社会话语而女性处于失语状态等。这些关于妇女社会地位共相的描述和表达，有力地支撑着妇女是“受压制”、“被压迫”的群体和处于整个社会从属地位的普遍性观点。因而，“妇女”指的是“在同传统男人进行不可避免的抗争中的妇女，是指必须被唤醒并恢复她们的历史意义的世界性妇女。”^① 而这一观点在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地域的扩展和传播也促进了关于“妇女”范畴的形成。在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妇女地位的大论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5号发表的《一九一六》中指出：“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并向社会发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的呼吁。^② 随后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妇女独立之品格的新文化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以“男女平等”的政治宣言，将妇女解放事业推到了社会实践和研究的中心。

“妇女”范畴由此被设定为一个稳定的、普遍的以及可以界定的同一体，并以此来区分男人和女人的基本差异。正如弗吉尼亚·沃尔夫所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要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祖国是整个世界。”^③ 当然，这一范畴遭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质疑：首先，“妇女”这一概念过于宽泛，超越民族、文化、阶级、地域、职业的妇女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本质主义的，这一独立整体并不存在，而是分散在每一个具体家庭中；其次，这种认同将男女生理的二元对立扩展到政治上的二元对立，以二元对立来强势塑造对女性的认同建构，从而使其理论诉求过于尖锐化；再次，作为将“妇

① [法]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页。

③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三块金币》，见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女”(同一性)维系起来的“妇女解放”,所要求的“平等”是与男性一样的“平等”,须在男人的认同中求证自己的价值,这样就带来了对两性实存差异的无视,而将自身的身份认同构建断送在宽泛的人权要求之中。总体说来,“妇女”这一范畴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建构女性的性别认同,它建立了一个关于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共同政治理想,并试图以此来有效地整合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对于“妇女”的认同。

第二种角度:主要以20世纪初到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批评为代表,该时期的女性性别认同研究以“反本质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即解构西方传统文化中被“客体化”、“他者化”的女性同一性。其中,三位女性主义前驱对于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有着重大影响:(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美)贝蒂·弗里丹和(美)凯特·米勒特。1949年,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发表了被誉为女性主义批评“圣经”的《第二性》。她谈到:

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①

波伏娃将基于生理划分的性别规定性sex,与基于社会认定的气质属相的gender区分出来,并对西方传统女性的人格模式进行了批判,指出男性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对立、否定女性来完成的,而女性gender则是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建构起来的。在性别的认同结构中,男性是界定者,而女性是被界定者,女性需要通过男性的界定去界定自身,“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名,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

^①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作者序”第11页。

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着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① 作为女性问题研究的奠基者，尽管波伏娃并没有直接探讨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问题，但显然，这种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的基本定位，已经为女性性别和身份的归属、群体特征及其存在问题建立了深厚的“反本质主义”基础。之后，在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和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1970）两部著作中，都对来自社会、历史中所形成的“女性”的性别特质展开批驳，对西方哲学、历史、文化中有关妇女的历史性偏见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在她们的影响下，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着重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针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分析清理了“经典”的男性文学中对于女性形象的歪曲性表现，并指出其身份认同建构过程。^② 其中，以理想型和反理想型的形象对比分析较为常见：以“天使”为代表的理想化形象，它模糊了妇女的真实和社会情况，引诱妇女们在虚假的神话中寻求慰藉；以“妖妇”为代表的丑化形象则夸大虚构了丑恶的女性形象，以达到惩戒和警示女性的作用，让女性自觉选择符合男性标准的“仙女”形象。女性主义对传统的男性视角进行了颠覆和反叛，其影响遍布世界各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女性同一性的想象，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关于性别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性别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为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在历史变化中提供了“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③ 波伏娃开启的“反本质主义”的身份建构论，就是要拆解从客观上形成的稳定、不变的关于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在这种虚假的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中，女性被纳入主客二元对立象征秩序之内，并被贬到了这一秩序的客体化、边缘化位置，既“内在”又“外在”于男性社会，既是被浪漫主义理想化的成员，又是被边缘的受害者。进而，彻底的解构女性主义者认为不存在任何关于女性的范畴。在解构完

① [法] 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序言一，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国内一些学者也译为“西蒙娜·德·波伏娃”。

② 参见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③ [英]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男性制造和维持权力话语的女性形象后，女性主义者回避一切对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的回答。茱莉亚·克里斯多娃说：“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不是’。”^①然而必须予以指出的是，漫无边际的解构主义在为她们抨击一切从属模式提供方法论依据的同时，却也使得女性主义者陷入了身份认同无家可归以及公共领域缺乏的意义碎片世界。它以“否定”的方式为女性认同确立了认同的边界，即女性主义者可以清楚地回答“什么不是真正的女性”，但却很难回答或者拒绝回答——“什么是真正的女性”或者说“女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很快从对男性文本的颠覆性阅读转向了对妇女文学创作主体的研究和对“妇女文学传统”的寻找上。

第三种角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致力于通过寻找或者书写“妇女文学传统”来建构女性的自我认同。如果说解构女性主义理论之功在于对“他者”的批判上，那么这一时期寻找“妇女文学传统”则将女性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对“自我”的发现上。早在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其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述了建立妇女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她认为存在着女性文学传统，只是由于男权制的压迫而使得这一传统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隐而不见或者很不明显。在伍尔夫的启示下，众多挖掘各国和各历史时期女性文学传统的代表性论著诞生。^②其中，肖尔瓦特提出了女性亚文化的观点，认为寻找或者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的基点，是女性共同的心理和生理体验。这种不同于男性的共同体验可以使妇女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非自觉的文化上的一贯性。她谈到：

对于英国妇女来说，女性亚文化群首先产生于一种共同的、不

① Julia Kristeva, *Woman Can Never Be Defined*, in E. Marks and I.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1, p. 137.

② 比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一部对妇女作品的文学和心理的考察》（1975）、詹·卡普兰的《现代美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1975）、艾伦·莫尔的《文学妇女》（1976）、肖尔瓦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及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等。（参见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断变得羞羞答答的和仪式化了的身体体验。发育、来月经、性欲的萌动、怀孕、生育和绝经——整个女性性生活系统——形成一种必须隐瞒起来的生活习惯。尽管这些情节不能公开讨论和承认，却伴随着极为复杂的程序和学问，伴随着客观的方式方法，伴随着女性团结一致的强烈感情。女作家们正是靠她们扮演过女儿、妻子、母亲这样的角色统一起来，正是因为法律和经济对其变动性的限制使之统一。有时，她们围绕一个政治原因用更直接的方式统一起来。^①

肖尔瓦特表现出了探求女性传统“一致性”的热情，企图为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建构共同的“原发性”来源。这种原发的女性身体体验，引导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投入到寻找同一性传统的过程中。这启发了一些女性主义者从女性的生理成长过程来认识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如吉尔伯特和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就将女性写作视为建构“女性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认为西方女作家在主题、意象及象征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疯狂”——正是女作家反叛冲动的“重像”，真正的女性自我意识就寓于其中。如果说，肖尔瓦特着重的是—种女性身份认同从无到有的历史建构，那么吉尔伯特和格巴则试图进一步找出使得这种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得以成立的内在一致性。^②这对围绕着性别而发展起来的“激进女性主义”颇具影响力，后者则从更极端的角度来推进这一女性自我的强势认同。^③

激进女性主义偏激地强调—种女性生物主义，将妇女的优点归结为生理属性而非文化和历史的塑性。比如南西·乔多罗提出女性自我身份的确立是建立在—与母亲分裂的基础上。母女关系被乔多罗称为“延长的依存关系”和“自恋式的过分认同”。男性由于与母亲的性别差异而可以彻底完成与母亲的依存关系，从而获得自主独立意识；而女性却由于和母亲无性别差异，而无法与其完全割裂从而无法获得完全的自主

^①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5.

^② 参见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③ 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主要包括格里尔的《女太监》、摩根的《女人的起源》、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戴利的《在圣父之外》等。

性，因此女性独立意识的确立必须建立在与母亲关系割裂的基础上，否则所形成是对母女关系的认同。^① 这种观点依赖于一个未经考证的预设：认同必定会转变成与母亲和他人的关联，并且把女性自我认同的危机归结于与母亲的性别一致，势必导致母亲和女儿关系的对立——但这并不符合事实。至于露丝·依利格瑞则提出以“女人腔”，在女性喋喋不休的感叹、半句话和隐秘中体现出“另一种意义”，这种言论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是一种流动的状态。^② 这其实是从女性的生理结构出发来建构一种完全属于女性的东西，与埃莱娜·西苏的“用肉体讲真话”^③ 极为相似。她们都力图以与女性身体相关的女性气质^④来整合女性的认同，认为女性是在主体和客体分离前就以某种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但这一提法未能成为妇女解放的有效策略，因为这是“以某一普遍化的、同质化的趋势把所有妇女淹没在‘女人’的范畴下”。^⑤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者对待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的态度是积极的，她们致力于把女人的“阴性”气质转化为女性的本真性，将其建构为一种女性自我的强势认同。从认同的客观角度来讲，她们强调中断与男性象征秩序的关联，在妇女文学传统中找寻一贯性，并以此作为整合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的依据；从认同的主观角度来讲，她们强调拒绝男性中心文化中的女性性别符号、形象和意义，让女性自身写作，在写作中体验女性“原发”的生理和心理经验，并以此来形成“主体”意识，

① 参见蒋欣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身份/认同”》，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② 参见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③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202页。

④ 与女性身体相关的女性气质，伍尔芙提出了“双性同体”理论，认为这一状态是女性最佳写作状态，是消弭两性冲突的方法。该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引起了争论，伊莱恩·肖尔瓦特就认为双性同体理论是对女性自身独特经验的压抑，将性别差异中和为一种特定的性别体系，因而不承认这一性别体系的存在。而埃莱娜·西苏则响应了伍尔芙的理论，从消除男女二元对立的意义上阐发双性同体，认为双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存在，只是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并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而拒绝双性化，而女性则更具有双性同体的包容性。这一理论被其他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发挥，比如露丝·依利格瑞就曾描述女性身体的特殊构造如何缝合两性差异，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神性。

⑤ Diana Fuss,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68.

从而有效地建构自我认同。与解构主义中女性意识无一不处于客体化、他者化相比，这种自我认同方式将以往的负载型认同转化为正面型认同，比如“把妇女的被动无力重新评价为‘爱好和平’，把她的情感形容为‘自然的倾向’，她的主观性便成为了‘增强了的意识’”。^①遗憾的是，从波伏娃开启的对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的本质主义的批判，到了这一阶段却又陷入新的本质主义怪圈。尤其是，这种“升级”的本质主义将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建构回归到女性独特生理体验上，其充满隐喻、别出心裁甚至超越于语言的神秘性感受令人费解，同时也就很大程度地限制了这类研究的深度。因为，这种认同建构在形成与男性绝对差异的同时，也在现实中杜绝了女性进入广阔公共领域并获得更多社会认同的可能。

第四种角度：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全球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影响下，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研究从构筑宏观的女性身份一贯性逐渐转向“多元主体”的女性身份认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佳娅特丽·斯皮瓦克、琼·司各特、伊莱尔·肖尔瓦特等，主张“女性”范畴要通过主体经验实践后再理论化，致力于探究一种既不陷入本质主义，也不游离于本质论框架边缘的性别主体的理论。这一走向，主张将女性的性别范畴回归于现实的社会身份中，在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以及各种学科中研究女性性别。其中，在以这种理论来具体解释女性性别和身份认同建构的理论中，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比较有代表性。以贝尔·胡克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在其《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著作中谈到：

女权主义对妇女命运的分析倾向于把焦点仅仅集中在性别问题上而没有为建立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她们反映了在西方父权统治者头脑中的统治倾向，即掩盖女性现实状况的真相，坚持认为性别是决定女性命运的惟一决定因素……黑人妇女认识到自己处于边缘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并且利用这一点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主义霸权，同时展望和进行反

^①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